

聚焦文学新力量

# 张惠雯：重返纯真与诗意

□曹 霞

的共同记忆。

## 寓言化写作

作为一种古老的写作方式,寓言以寓理的深广性和普泛性成为重要的文体。当我们都认为“70后”缺乏寓言思想与精神含量时,张惠雯却从这里出发,坚持不懈地探索小说中抽象化与哲理化的表达。

在张惠雯那里,寓言最重要的功能是探索复杂人性与纯洁自由精神的关系。《水晶男孩》中那个美丽透明的水晶男孩让污秽中的世人感到不安和恐惧,他自己也遭到了世俗力量的不断磨损。《徭役场》很容易让人想起《一九八四》《美丽新世界》等“反乌托邦小说”,在未来的世界里,人们受到规训和奴役,难以反抗,终被规训。这两篇小说既可以理解为“人性恶”和“奴性”的寓言,也可以理解为某种形而上的哲学寓言。

《极速列车》是一个关于高速发展社会的寓言。在世界上最快的列车上,“无知者”沉浸在科技的刺激之中,瓦特及助理爱因斯坦不停地做试验,以让其更高速地前进。这篇小说涉及科技、速度、教育、虚幻与真实等多个主题,它们共同构成了高速发展的危机预言,以看似荒谬滑稽的设想深刻地揭示出了当下情境中人的生存状况。

《岛》和《岛上的苏珊娜》更像是从神话和人类生活中截取 的片段,人物的对话远离烟火气,间以大量的讨论和思索以及充满诗意的描写。《岛》设想在一座岛上,一对男女过着亚当夏娃的“乐园”生活。一艘大船的到来打破了他们长久的宁静,让他们对此彼此充满了嫉妒和恐惧。而《岛上的苏珊娜》恰好和《岛》形成“逆向”推演:一个由“信”走向“不信”,一个由“疑”走向“交融”。“我”和苏珊娜展开了关于男人和女人、灵魂和肉体的对话。他们意见相左,却不妨碍彼此讲述古怪而没有意义的梦,直到“在荒凉的岛上,她的眼睛是惟一的灯”。这两篇小说没有鲜活的现实生活,氤氲在作品中的只是一些片段、吃语和文不对题的对话。它们都可以视为对两性关系中“忠贞”问题的寓言性探讨,在折射出以爱情为象征的精神世界可能出现的空洞时,也在盘活着“爱情何为”、“生命何为”等终极命题。

《安娜和我》则以纯净悠扬的韵味揭示了如下命题:只要坚持,安详宁静的精神可以一生相伴。安娜是一头大象,贫穷的“我”善待她,视她为灵魂的伴侣。这篇小说具有诗一般纯粹的精神质地。它的寓言力量来自于“安娜”,她不仅仅是一头大象,更寓意着每个人生命中如影随形的精神物象。随着个体的成长与见证,它们最终会成为生命中不可缺失的部分,构成相互映照的瑰丽镜像。

张惠雯的小小说有着浓郁的“诗意”:洁净、空灵、轻逸,囿于尘世又超拔于此,有直袭心灵的精神物象,也有潜意识世界的丰富和深邃。在被关于人性的忧虑和未来的宿命感所笼罩时,她也在不懈地寻找具有个性、艺术性又不乏公共认知的精神表达,由此建构起属于自己的诗性沉思录。一切留恋着诗意和纯真的人,一切愿意在文学中寻找心灵自由与呼应的人,都可以在她那里感受到精神世界的优美和深邃。

## 写给子孙后代的一本传记

□李朝全

追忆和记述,自然便具备了独特的价值。郭振西自称是“三无人员”,无文化、无文凭、无职称,少年时家境贫困,少小持家。只念过3年书,基本上都是在工作中通过自学、向别人求教等最原始但也是最有效的方式学习知识,掌握文化。他10岁起便开始帮着家里运盐贩卖,15岁当儿童团团长,接着任区公所通讯员,一步步走上社会,当过金库保管员、会计、保险公司经理、人事组织干部、地质矿产部门领导等。他的经历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能够带给读者以激励和鼓舞。

对于作者自己的子孙后代,它的教育价值更为明显。它不仅可以帮助子孙们了解自己父辈艰辛而不凡的人生,更可使他们从这种人生历练中汲取力量源泉。书中有诸多的人生感悟和体会,如以诚待人、厚道处世、多做好事、宽容大度等。作者是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为人处世之道,抒发了自己对于平凡人生的真知灼见。

郭振西经历的历史风云某种意义上成了历史的见证与记录。他的人生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高

## 为明天留住善良

□胡银芳

出,家庭的反对、世人的评说、伦理观的冲撞让他不堪重负,但是他坚持了下去。

《婚刺》中的另一个圣人就是程紫月。她在不认识汤煜峰时两次给他捐献骨髓,不求回报。她的这一做法,是因为她曾经接受过不留姓名的好心人的帮助。为了延续这份好心人的爱,她决心把救助别人的爱进行到底。在知道自己孩子的班主任难为、挑剔孩子的时候,她一次次与老师当面对话,哪怕不被理解,哪怕老师依旧对她的孩子百般刁难,她也不愿意放弃做人的原则。程紫月身上蕴含着极大的牺牲、包容精神。也许这就是瑛子追求的理想人格。

瑛子说:“每次开新篇前,总少不了花较长时间去寻找素材,试图寻找到那种与众不同的、使作品具有独特气质的、能给读者提供阅读新体验的东西。”为了长篇中的一个细节,瑛子会到咖啡馆去坐半天。闲暇时走过的一片林、一座山,花草散发的芬

张惠雯,女,生于1978年,祖籍河南,现居美国。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曾获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斯文学新人奖、首届“人民文学新人奖”、新加坡国家金笔奖中文小说组首奖等。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徭役场》《水晶孩童》《在屋顶上散步》等,2013年出版短篇小说集《两次相遇》。

这些充满“残缺”和“磨蚀”的故事是现实生活的常态,它们携带着当下的精神荒凉与颓败,以一种生动的、带有一代人生存印记和命运变化的经验“素描”了一个时代的肖像。张惠雯不是为了证明“纯真”会遭到损毁,而是向着人性的黑暗和深渊发出询问。她并不寻找答案,却在磨损和罪恶里铺展出人性中模糊而犹疑的地带,从粗鄙和堕落中看出人的“洁白”。

## 向着现实敞开

在张惠雯看来,描写现实时“经验”固然重要,但“小说作者最好还具备洞察力、感同身受的能力和想象力”。在面向现实的写作中,张惠雯有一种“敞开”的姿态。也许正是因为经历单纯,她反而能够扩展写作的边界。越是进入遥远而边缘的界域,她越能够毫无遮拦地展开虚构和叙述,越能够像“身处其中”那样把故事叙述得绵密细致、淋漓逼真。

在张惠雯的作品中,以对话为主的《垂老别》颇见功力。小说以3个夜行人展开故事,王老汉、他的弟弟和村长为了老人的赡养问题去找他的小儿子,却遭到冷淡推脱。一个坚守传统伦理却最终被亲人盘剥得一无所有,内心充满尊严、畏惧和难堪的乡村老人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小说撤去了笼罩在亲情和血缘之上的礼仪道德,以精微贴切得近乎冷酷的叙述还原了人的本性。《路》通过孤苦无依的老妇人去看望教友小宋,将教友们凑的钱送到老郭家两段故事,细腻地铺陈出老人们在破败无望的现实生活中追求精神彼岸的心境,并把不同家庭的生存景象连接起来,呈现了“人之老境”的凄凉图景。在小说结尾,老妇人在雪地里缓慢从容地行走,心中没有阴影。一种由生存本相生发而成的坚韧结实成为文本的底色,对“尘世之苦”的出离使小说弥漫着淡淡的诗意。

张惠雯“写实”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最具当下情境和时代变化特征的情感故事。《完美的生活》讲述了在新加坡生活的6对中国男女的爱情与婚姻生活。在复杂的男女关系和变幻莫测的组合背后,是他们共同的爱之匮乏与焦虑。《蓝色时代》写一个男孩对妈妈的同学产生的朦胧情意;《暴风雨》叙述了一对男女被困于车内的一段“婚外情”;《小角色》以日记体形式展现了一个在爱情中极其尴尬和痛苦的女性内心世界。作家以对激情与理智的深切观察、对人性和情感变迁的敏锐捕捉,讲述了一个个困惑于生存与入伦、或者在道德边界游移的爱情故事,层层崭露出人性里最黑暗本真的部分。

张惠雯笔下有这样一类女性,她们或生机勃勃或安静素淡,对男人和世界的认知是天真而茫然的。比如《年轻的妻子》中那个饱满害羞却行踪不定的小妻子,《书亭》中那个在书亭里度过青春只能对窗外世界抱以幻想的女孩。她们在婚姻和爱中的耽溺、想象与犹疑,展现出女性在混乱荒芜的境遇中对“完满”的坚守,即便生活最终被证明为破败不堪,但坚守本身就敞开了面向一切的可能性。

张惠雯的现实题材很“陈旧”,但她通过对现实细致而生动的处理,对世俗人物不断尝试与冒险的审美判断,生成了既属于写作者个体、也属于一代又一代人成长经验和生活经历

## ■评 论

### ■新作快评 赵文辉《张菊花的拐角楼》《安徽文学》2013年第9期

## 跨越「蝶变」之痛

□非飞鸟

赵文辉是一位擅长于讲故事的作家,也是一位有着鲜明时代感和地域文化自觉的作家。他的作品根植于豫北大地,他用自己饱含深情和富有地方气息的笔调,热情地书写着豫北乡亲们有情有义、有血有肉、有笑有泪的生活。中篇小说《张菊花的拐角楼》就为读者观照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生活打开了一个敞亮的窗口,让人们窥见芸芸众生的命运沉浮以及人性深处的善与恶。

小说讲述了农村姑娘张菊花与象征社会地位的“拐角楼”的恩恩怨怨。张菊花第一次“受伤”是读初中的时候,在同学的怂恿和自己的虚荣心“作祟”下来到“拐角楼”找表姐。不料却被表姐奚落,在同学面前丢尽了颜面,从此,张菊花与拐角楼“结怨”。第二次“受伤”是因为自己青梅竹马的恋人小庆因为在“拐角楼”工作的同学姬小娜奔走,遂与拐角楼“生仇”。从此,张菊花的命运进入了人生低谷。她撕掉了不能让自己抵达“拐角楼”的师范专科学校录取通知书,采取种种手段誓死要进入“拐角楼”,一洗自己所受的屈辱。

然而,作为一个没有任何背景 的农村女孩,张菊花与“拐角楼”的斗争无异于堂吉珂德与风车的大战。要到拐角楼工作,成为一个吃国家饭的公家人,似乎比登天还难。在“追梦”的过程中,张菊花先是被“仙姑”骗去了3000元钱,进而被县委办周副主任奸污,一次次地受尽了人间屈辱。沉重的代价不仅没有让张菊花挤进“拐角楼”,反而让她身败名裂,被逼入人生的绝境。万念俱焚的张菊花走投无路,偷偷爬上一辆运沙的拖拉机漫无目的地出逃,不料却邂逅了自己的中学同学,认识了给她命运带来转机的包工头小强。勤劳朴实的小强后来成了性格倔强的张菊花的丈夫,并且为给张菊花“疗伤”找到了药方——他买下了破产的“拐角楼”,让张菊花最终成为了它的新主人。

透过赵文辉给我们精心编织的故事不难发现,《张菊花的拐角楼》之所以感人至深,就是因为作家在这个故事中写出了以张菊花为代表的一代人的命运,赋予人物以鲜明的时代特征。透过故事不难发现,张菊花与“拐角楼”的恩恩怨怨,不仅是一个人与一群人的恩怨,而且是一个人与这个不断变迁的时代 的恩怨,更是地位、名利和人性善恶之间的战争。张菊花富有悲情色彩的“追梦”过程无疑是弱肉强食的过程,也是人性在特定的时代中被不断异化的过程。在张菊花的受伤经历中,权力、地位、金钱以及人性的贪婪、虚伪和欲望的膨胀可见一斑。赵文辉巧妙地通过“拐角楼”这个典型环境,塑造了一群特殊的典型人物,从而再现了迷乱的时代生活场景,让世间善恶粉墨登场、人性美丑纤毫毕现。

随着时代的变迁,“拐角楼”由胜到衰落到破产,曾经风光一时的“拐角楼”和那些风云人物都已日暮西山,张菊花的情敌姬小娜和风光一时的表姐都不可逆转地被时代淘汰和抛弃。

北村说:“好作家像一台完美的窃听器,能听到自己时代内部的对话;平庸作家只记录喧嚣。”毫无疑问,在《张菊花的拐角楼》中,赵文辉用他敏锐的笔触记录了时代内部的激烈对话和形形色色的精彩表演,让我们窥见了小人物在特定的时代“拐角”所经历的“破茧”之苦和“蝶变”之痛,既惊心动魄,又发人深省。

悲”、“宠辱两不惊”的心境。或许,过去的都是历史,历史永远不会给作者留下创伤和仇恨,而带给他的只有平静的波澜不惊的心境。

《难忘岁月》的文字是个性化的,带着深沉的感情。从作者的讲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主人公是一位自信、自强、自立的人。他富于进取心,一生都在拼搏与奋斗中度过。在回忆父母和发妻时,作者满含深情。此外,偶尔能读到作者的睿智、幽默之语,这些都需要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思索作为积淀。

作品中有许多鲜活生动的情节,如作者少年时为了苦读书,半夜躲在伙房里看书被当作小偷抓起来。他自小持家的经历、80年间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惊心动魄的经历,得了肺结核死里逃生没关上火便“落荒而逃”,母亲第一次听到收音机里的声音感到无比的神奇和惊悚,以后总称其为“戏匣子”,饥荒时期姑妈每次来家送点粮食总 要顺手拿走点东西……

《难忘岁月》,难忘人生。对于作者来说,这是一段有价值的独特人生;对于读者来说,这是可以让人思考和启迪的人生。

芳,都能在她的心中萌发一个细节和人物的一个侧面。这些从生活中提炼出的人物有特点,很真实,仿佛就在我们身边。《爱情的诱惑》是瑛子的第9部长篇小 说,也是瑛子第8部即将被搬上电视荧幕的作品。作品讲述了年龄相近、生活条件迥异的3位主妇的婚恋故事,揭示了贫富差距、高房价等社会问题。瑛子说:“我一直把情感、情义看得很重,所以经常听闻或看到社会中那些因名利钱财而背叛残杀的事,心里总是很失落,难道这世上真的就没有人能够遵守承诺和信义吗?当时就有了这么一个念头,想要写一个专门讨论忠诚和承诺的故事,于是就有了《爱情的诱惑》中的这几个人物。”瑛子说:“洪山是一个理想人物,也是我的理想之一。如果人人都能像洪山那样,我们这个社会将会多么干净和和谐,每个人都会觉得轻松快乐。遗憾的是,理想终究是理想,现实还要继续。我只能在每一本书里,继续我的理想。”

瑛子是讲爱情故事的高手,但她首先是一个有社会责任的作家。让责任和道义蕴含于故事当中。她的每部作品都牵扯到非常敏感的社会问题,但她不仅仅是揭露问题,同时还分析原因,找出问题的症结。

## 沉默的美学

□张惠雯

## ■创作谈

9月的某个夜晚,我和一位写小说的朋友走在北京的街头。迎面走来一群说个不停 的西方人,这位朋友告诉我,他认为这些西方人过于吵闹,他们太爱表达,不懂得沉默的含义、沉默的美。的确,在社交生活中,美国人把“害羞”、“内向”看成一种缺陷,甚至当成有待治疗的心理疾病。掩藏起来的美学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大概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小说会走向另一端:极简。极简有它的启示意义,但我并非极简的崇拜者,这就像一个人喜欢匀称的身段却未必追求骨感。

无论是福楼拜的《三故事》、乔伊斯的《都柏林人》,还是契诃夫那些不朽的短篇佳作,其特点之一还是纤秾合度,把最应表达的表达出来,把应掩饰的置于昏暗的沉默中,因此,它们才具有异常耐读的品质。在这些作品里,细心的读者会从词句里的蛛丝马迹、巧妙的隐喻和映照中发现未写出来的内容,它们就像绘画里的阴影和留白,与光亮的部分一起决定着作品的质感、深度和氛围。当我们沉默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做另一种表达。

我很喜欢爱尔兰小说家威廉·特雷弗所说的:“如果把长篇小说比作一幅复杂精细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短篇小说就是一幅印象派绘画。它应当是真实的迸发。它 的力量在于,它略去的东西,要不是很多的话,正好和它放进去的等量。”如果语言表达追求的是“意尽”,在我看来,短篇小说并不服从这个原则。在说与不说之间、表达与掩饰之间、描述与暗示和隐喻之间,存在着那么一个点,短篇小说的作者除了化炼词句,绝大多数努力似乎就是寻找这个点,尽我们所能去接近它,使小说呈现恰好的明暗度、匀称而又有血肉感的美。否则,小说就会面临粗鄙露骨或干瘪之味的危险。

契诃夫曾说:“好的、坏的,都不要叫出声来。”大概他早已发现,“忍住不说”对写作者来说其实无比困难。无论在他人的小说里,还是在自己的小说里,我多少次发现作者说得过多?在我的写作过程中,我多少次要和“说出来”、“说清楚”做一番严酷的斗争?大多数时候,我失败了,我把应该删去的句子重新加到小说里去,惟恐人们体会不到我的用意,结果,理应沉默的地带变得喧嚣,小说的美感被破坏了,矜持的艺术法则遭到破坏……我觉得我是在“删除”、“恢复”、“再删除”、“再恢复”中多多少少学会了一点儿忍耐的技能,尽管时至今日,我有时仍会把一些理应删除的废话当珍宝。

日常生活中的人与事、人在平静生活表面之下内心的风暴和曲折更吸引我的注意,它们对我来说更富于诗意,也更易唤醒我的联想力。有时,别人告诉我一件小事或者一个细节,我会听得着迷,如果他们告诉我一件波澜起伏、高潮迭起的故事,我反倒不知所措。我想我只能当一个印象派的小说家,宏幅巨制对我来说是不适宜的。我宁愿让精练的词语、细节和氛围说话,以便使人物突出,而非使情节突出。我的短篇小说常常缺乏情节,它更像是个随意截取的、现实生活与心灵生活交织的片段,对我来说,这个片段式的情节是一种真实,或者说,它是表达人的真实的一个手段。

我喜爱的人物往往不怎么外向、健谈,在一个懂得适时沉默的人身上,我能发现更多的美和故事性。在今天的社会,露骨的展示、大声的叫嚷已成为吸引注意的普遍捷径,而我仍固执地要求我的人物为了美感而保持基本的矜持,这实在是个不顺应潮流的嗜好。可每当要求小说家为大众口味的改变而“改善”自身的呼声响起,我反而更顽固地想要守住自己的阵地。如果一个小 说家不能影响读者的思维与感受,那么至少,别让读者轻易地改变了你。